

“新芽沙龙”第 26 期

叙利亚经济与社会现状

2020 年 11 月 3 日

本期新芽沙龙邀请到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公共管理硕士、叙利亚行政发展部人力资源主管巴沙尔·赫尔 (Bashar Kheir)，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公共管理硕士、叙利亚规划与国际合作委员会官员阿斯玛·凯特贝 (Asma Katbeh) 围绕“叙利亚经济与社会现状”主题，从不同视角进行交流和探讨。

赫尔的报告题目是《叙利亚：中东的核心正在遭受苦难》，内容包括叙利亚的地理位置，人文遗产，开放政策，战争对叙利亚的影响，制裁、战后重建、未来挑战与“一带一路”倡议 (BRI)。

赫尔认为，关于中东的构成有很多概念，其中一些与土耳其相关。历史上的黎凡特是指由“现在”的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地区、埃及与阿拉伯半岛构成的大叙利亚。扩展的中东概念 (大中东) 则从被称为马格里布 (Maghreb) 的摩洛哥开始，包括非洲北部、埃及并延伸至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国的西部边界。这在美国政府新保守派在本世纪头十年绘制中东新地图时所提出的“新中东”概念中得到了强调。

叙利亚位于亚洲西部，地中海东岸，面积约 18.5 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 193 公里，包括自 1967 年就被以色列

军事占领的戈兰高地，该地区土壤肥沃，植被多样，自然资源丰富。2018 年，叙利亚人口约为 1750 万。叙利亚的劳动力分布在三个基本部门，其中农业占 11%，工业占 26%，服务业占 63%。叙利亚的城市化率约为 54.2%，但赫尔指出，叙利亚的城市化并不伴随着工业化，而是存在城市化与工业化不平衡的弱点。在中国，城市化往往伴随着工业化，但是在叙利亚，它们大多是大城镇，而不是真正的城市。

叙利亚在历史上被称为黎凡特，与其相邻的美索不达米亚（现为伊拉克）是人类生存和世界文明的摇篮，因此在肥沃的新月地带周围产生了许多文明，其遗迹可追溯至 7000 多年前。大马士革是世界上最古老且持续有人居住的首都，它建成于公元前七千年，也有研究表明，它可能建成于公元前 11000 年。在文化方面，它拥有最古老的字母，最古老的音乐和符号——胡里安人赞美诗。

赫尔称，上世纪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制度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崩溃后，叙利亚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2000 年之后，采取了诸多立法和行政措施加速经济开放，促进叙利亚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中。例如，叙利亚主动开启了加入欧元区的进程，2005 年推出了“社会市场经济”概念，并于 2010 年成立了“叙利亚加入世贸组织工作组”，但这一努力却因战争而被迫中断。

战争对叙利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根据联合国 2016 年的统计数据，叙利亚内战造成约 40 万人死亡，620 万人流离失所，约 560 万人成为难民，还不包括未经联合国登记的其他难民。2017 年叙利亚的失业率超过 50%，现在情况更糟

糕，2018 年的贫困率超过 82%。月工资由战争之前的 400-500 美元降至 2020 年的 40 美元。基础设施的破坏使人们无法持续获得医疗保健、教育及其他服务。由于所有经济活动全部中断，2016 年叙利亚的国内生产总值与 2010 年相比缩水了 400%，累计损失约 2260 亿美元，高失业率、高通胀率也随之而来。尽管在 2017 年之后有所改善，但受美国 2019 年通过的《凯撒叙利亚平民保护法》（俗称“凯撒法案”）所实施的非法双边制裁，以及欧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所强加的其他制裁的影响，叙利亚 GDP 年增长率持续受挫。目前叙利亚的重建主要面临三个挑战，首先是在面临单方面非法制裁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复苏，其次是国家重建和国家建设，第三是体制改革和反腐败工作。

赫尔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为叙利亚的重建做出了贡献。从历史上看，叙利亚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此外，叙利亚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必经之路，在战略和地缘政治方面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有诸多好处：可以将中国过剩的基础设施产能转移到中东，尤其是在这方面存在问题的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支持这些国家通过体制改革和反腐败努力以减轻经济封锁的影响，并为电气化运输、工业化、自由贸易、绿色城市和经济特区等建设铺平道路。

阿斯玛·凯特贝作了题为“中国和叙利亚：从援助政策到战后重建中的经济伙伴关系”的发言。她认为，经济外交是指传统外交的经济维度，即利用所有与外国的合作渠道及框架来支持本国的经济发展。经济外交的优先事项之一是通

过寻找新兴市场、吸引外国商人和公司来促进投资。

凯特贝简要介绍了中叙关系的三个阶段：叙利亚战争前-有限的经济合作；战争期间-援助政策；战后-期待进一步的经济合作。她指出，叙利亚是最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中东国家之一，两国在 1956 年 8 月 1 日正式建交。虽然两国外交关系始于 64 年前，但经济合作却并未反映出两国关系的深厚。与该地区其他阿拉伯国家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与中国正式建交的海湾国家相比，经济合作较为有限。叙中双边关系由一系列协定和谅解备忘录所规范，主要分为四类：（1）已签署的 26 份有效文件（19 份协定，2 份议定书，3 份谅解备忘录，2 份执行方案），涵盖了包括经济与对外贸易、金融、农业与土地改革、通信技术、石油与矿产资源、旅游观光、医疗保健、文化与传媒等诸多领域。上述文件是在战前签署并生效的。（2）待批准的已签署文件，包括经济与对外贸易领域的两份文件以及财政金融领域的一份文件，分别为叙利亚出口发展与促进委员会和中国商务部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叙利亚商务部对外贸易局与中国商务部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及叙利亚中央银行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上述文件均于战前签署。（3）正在研究中的文件（战前拟议）。包括经济与对外贸易、金融和关税、农业、通信技术、交通运输、医疗保健、环境保护、设计规划及国际合作等领域的 18 个文件。其中一些文件已经草签，正等待正式签约程序的完成，而另一些则仍处于研究中。这些文件也是在战前签署的。（4）正在研究中的文件（战后拟议），包括涉及工信部的两份文件和司法部的四份文件。这

些文件目前正在讨论中。与其他一些海湾国家相比，中叙双边贸易并没有突破相对有限的经济合作范围。据联合国统计，2019 年中国在与叙利亚的货物贸易中出口 13 亿美元，进口 140 万美元，而同期中国与阿联酋的双边贸易达到 485 亿美元，中国与阿曼的双边贸易达到 164 亿美元，这两个国家都要晚于叙利亚与中国建交。

凯特贝认为，叙利亚危机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具破坏性的危机之一，引发了大规模的物质性和社会性破坏，基础设施毁坏，大规模的难民危机和严重的经济衰退。根据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与圣安德鲁斯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合作撰写的报告《叙利亚战争八周年 (Syria at war, eight years on)》，这场危机造成的经济损失约 4422 亿美元，包含有形资本的损毁估值 (1177 亿美元) 及 GDP 的预估损失 (3245 亿美元)。住房、采矿、证券、运输、制造业、电力和医疗卫生七个资本密集型行业受损最为严重。尽管叙利亚并非中国的战略重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叙利亚战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无动于衷。中国对叙利亚内战的态度是由其长期奉行的尊重国家主权、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所决定的；在实践中，中国对叙利亚的外交交往也十分谨慎。另一方面，有证据表明，中国在通过双边渠道和多边渠道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2017 年 1 月 18 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指出，中国将向叙利亚难民及流离失所者提供 3000 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同年，中国还为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一项计划提供了 150 万美元资金，帮助新抵达约旦的叙利亚难民。此外，中国分别向世

界卫生组织(WHO)，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捐赠了 100 万美元，以改善叙利亚的粮食安全和卫生服务。

2017 年以来，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与叙利亚计划和国际合作委员会签署了多份协议，向叙利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具体内容如下：2017 年 2 月 5 日签署一项总额 4000 万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协议；2017 年 2 月 5 日签署一项总额 7000 万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协议；2017 年 5 月 13 日签署一项总额 2 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协议；2019 年 3 月 10 日签署了一项总额 1 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协议。目前正在讨论签署一项新的总额 1 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协议。

凯特贝表示，随着西方继续对叙利亚实施制裁，中国将成为大马士革平衡西方压力的重要国际合作伙伴。在 2019 年 12 月的一次采访中，阿萨德总统表示希望中国公司关注并研究叙利亚市场，其市场安全性方面正在逐渐改善。他说，大马士革的官员正在与中国公司进行商讨，以找出规避制裁、改善进入叙利亚市场的途径。他还解释说，中国和其他友好国家对叙利亚重建的支持与打击恐怖主义、恢复叙利亚稳定的军事努力同样重要。“一带一路”倡议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国际合作举措之一，为叙利亚和中国提供了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机会，中国可以通过在石油、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合作，扩大中国公司在恢复和发展基础设施（电力、交通、建筑、通信、水资源等）重大项目中的参与，并借助于加强和发展基层部门人力干部的培训计划与专门项目来支持叙利亚的重建进程。

叙利亚官员不仅欢迎中国参与重建，还为此做出积极努力。2017 年 9 月，叙利亚驻中国大使伊马德·穆斯塔法对中国投资者说，只有中国才能在帮助叙利亚实现重建的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根据叙利亚政府的指示，叙利亚投资委员会与叙中商业委员会举行了一次有关在叙利亚投资的会议。叙利亚投资委员会总干事哈拉·加扎尔表示，此次会议是根据该委员会在叙利亚商务部指导下制定的工作计划召开的，主要是为了促进重建叙利亚投资，其中最优先的就是为受影响的项目以及所有重建领域的生产线提供支持。哈拉·加扎尔说，叙中商业委员会积极响应、协同合作，未来一段时期它将成为合作伙伴和经济代表，促进中国对叙利亚的投资。据世界银行估计，从中国方面来看，重建叙利亚至少要花费 2500 亿美元，是叙利亚 2010 年 GDP 的四倍。中国打算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且不会面临来自西方的真正竞争。

凯特贝指出，几件大事凸显了中国对叙利亚的兴趣。中国阿拉伯交流协会仅在 2017 年就曾四次派代表访问叙利亚。在访问大马士革和霍姆斯时，中方代表明确称许多中国大型企业表达了对参与叙利亚基础设施项目的兴趣。三个月后，北京主办了首届“叙利亚重建项目交易会”，承诺投资 20 亿美元建设产业园区，1000 家中国公司参加了此次活动。同时，中国企业正准备在叙利亚各地开设代表处，并派遣常驻代表团以寻找可能参与的项目。在 2018 年中阿合作论坛上，北京宣布了一项总额 230 亿美元的贷款和援助计划，其中一部分有望提供给叙利亚。受中国政府的邀请，2019 年 4 月叙利亚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

然而，由于美国在过去九年中对叙利亚政府实施了许多制裁，因此中国也面临挑战。美国的《凯撒法案》切断了所有国家与叙利亚政府的经济往来，其中一项条款规定，将对所有与叙利亚政府打交道的国家、公司和个人进行起诉。中国公司将受制于这一禁令。美国根据这一法案将制裁扩大到与任何叙利亚政府实体打交道的个人、机构、公司和国家，这就影响了中国华为公司与叙利亚通信部在 2015 年签订的维护通信基础设施的合同，以及其他出口重建材料的中国实体公司的合同。

最后，凯特贝认为，北京对叙利亚的策略仍是谨慎的，强调不干涉原则并致力于发展经济关系。在整个中东，阿拉伯国家正在向北京伸出双手，特别是在美国被视作不可靠的盟友，而欧洲缺乏在该地区开展项目的能力的情况下，这些政府认为与中国合作更具价值。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和美国外交政策的不断变化，中国进入该地区的步伐很可能会随着叙利亚重建的开始而继续深入。

在讨论环节，现场听众与两位报告人就上述内容进行交流。

沈欣：赫尔先生提到，国家构建是叙利亚重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它使我想到一个政治概念——“国家能力”，它是指国家制定并有效执行内外政策的能力。请问您认为叙利亚是否具备了强大的国家能力以领导重建？何种因素会影响叙利亚的国家能力？另外，您提到自我可持续的制度改革，可否更详细地解释一下？

赫尔：关于重建，叙利亚的国家能力确实不足。但另一方面，现在的局势几乎已经稳定下来。因此，叙利亚政府可以启动实际上已经开始的国家重建。除美国实施的制裁外，没有更多的障碍会阻止重建有效进行。该制裁禁止包括食品、能源或石油衍生物在内的任何商品进入叙利亚，同时，该制裁会处罚所有与叙利亚政府打交道的个人、政府或公司。这是叙利亚面临的主要限制。另一方面，叙利亚的腐败程度很高，尤其是在战争时期，因此政府决定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来减轻腐败。三年前叙利亚总统就发起了国家行政改革项目，在叙利亚的服务部门、生产部门，尤其是公共部门中打击腐败并建设强大的制度能力。

沈欣：我还注意到，两位都提到战争造成超过 600 万人流离失所。因此，我也很关心叙利亚人民的生活是否随着重建过程的推进而得到改善？他们现在的精神状态如何？是否对对国家重建有信心？

凯特贝：国家重建是我们唯一的希望。由于长达八年的战争，一切都被摧毁了。战争结束后，我们的经济形势非常糟糕。因此，虽然重建过程包括许多方面，但经济复苏是第一位的。当然，人们从创伤中恢复需要很长时间。当您生活在经受战火、经济状况不佳的国家时，除了为生存而努力工作外，别无他法。因此，我们希望重建不会花费很长时间。但是我们需要来自友好国家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专注于与中国的合作，因为我们与中国有着良好的关系。在叙利亚被摧毁、经济形势不佳的情况下，中国是唯一能够支持我们的国家。同时，我们还受到了制裁，因此也需要一个超级

大国来支持我们。叙利亚国内的储蓄不足以进行重建，虽然叙利亚人民对重建进程充满热情，但其能力特别是财政能力是有限的，因此伙伴国家的援助与合作就非常重要和关键。

沈欣：有研究认为，叙利亚的“重建格局”在地理上是分散的，且政治纷争、局部暴力、裙带关系、腐败及官僚主义的失调较为显著，所有这些都会对未来的经济活动产生不利影响。此外，中国公司在参与重建项目的同时，也存在违反美国对叙利亚制裁的风险。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如何改善安全和投资环境以实现长期、稳定的合作？

赫尔：除了北部一些地区，叙利亚现在几乎是安全的。合作的主要障碍是制裁。有媒体称，我们的总统宣布与中国达成一项协议，但我们不知道该协议是否包括制裁部分。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详细信息。正如您所言，叙利亚的一小部分地区还不受政府控制，但有超过 80% 的地区正处于叙政府控制之下并且是安全的。

王锁劳：三年前，叙利亚驻中国大使应邀参加了北京大学的研讨会。当时，我也问他同样的问题。他积极地邀请所有中国人赶赴叙利亚，获取所谓的“第一桶金”的机会。实际上，现在比三年前要好得多。但是我认为仍然有很多中国企业对此感到担忧。对于他们来说，中东有很多国家，尤其是海湾地区的国家，那么为什么要去叙利亚呢？它与土耳其仍然存在冲突。有时，机遇与风险应该并存吗？

凯特贝：这种风险是可以减轻的，特别是现在安全局势已经稳定了。我们现在的挑战是经济形势。

殷金琦：自安倍晋三执政以来，日本政府开始将其中东

政策从消极转变为积极，从能源和经济转变为能源和政治平衡，以改善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我知道日本政府急于在世界范围内与中国竞争基础设施项目，特别是高速铁路项目或其他项目，而且它们具有很多优势，例如技术和金融能力等。因此，您认为日本或其他西方国家，是否有可能参与叙利亚重建？与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优势是什么？

凯特贝：我们正处于非常恶劣的情势中，因此我们欢迎所有有兴趣参与叙利亚重建进程的国家。但是问题在于制裁，它是叙利亚与其他国家合作的最大障碍。

殷金琦：但是我认为也许日本政府，特别是其上一届内阁与美国政府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有较好的外交关系。例如在2019年，日本政府在伊朗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也许日本公司或其他私人投资者可以获得更多资源来摆脱制裁的威胁。

凯特贝：我们希望如此。但是举个例子，因为我在叙利亚规划与国际合作委员会工作，所以我知道我们与日本没有这种合作关系。叙利亚和日本之间没有任何合作文件，但是我们当然希望能与日本合作。

赫尔：另一个问题在于日本的外交政策与美国的政策息息相关，并非不受其影响，因此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完全批准，日本就无法开展这种合作。换言之，日本的政策是依附于美国的，这与中国的独立外交政策不同。美国对叙利亚的制裁使任何与叙利亚有关系的国家都站在美国的对立面。因此，它有点复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专注于吸引中国公司的

原因，因为他们有能力做出决定。

罗安澧：战后叙利亚政府如何才能再次团结整个国家？教派问题、部落主义或族群问题会阻碍叙利亚的经济重建吗？

赫尔：也许媒体夸大了叙利亚教派及族群多样性的问题。叙利亚战争的主要原因本质上是外部的，内部多样性只是造成叙利亚危机的虚假原因。因此媒体报道与事实不符。几千年来，我们一直与这样的多样性共存，并不存在任何问题，因此现在仍然没有问题。但是叙利亚的确面临许多挑战，特别是在宪政改革方面，已经有一些委员会被委派去商讨宪政改革及叙利亚新宪法的相关事宜。教派及族群多样性问题和特别迫切的权力下放需求等问题也将受到关注。造成叙利亚危机的内部原因之一是失业率高企，这是由 2005 年之后发生的干旱造成的。当时发生了大规模从农村地区到城市或收容所的国内迁移。因此，在大马士革、阿勒颇等主要城市的周围就有很多庇护所，这些地方是反政府抗议行动的发源地。

罗安澧：另一个问题关于复兴党，他们在叙利亚社会或政府中的作用是什么？

赫尔：在 2012 年宪法修正案之前，复兴党曾是社会和国家的指挥官，现在只是许多政党中的一个。因此，虽然叙利亚有分属左翼、右翼的许多政党，但是这些政党并不具有太大的影响力，复兴党则是其中最强大的政党。在叙利亚，某些政党及其纲领是被禁止的。例如“穆斯林兄弟会”，该组织于上个世纪在埃及成立，随后传播到叙利亚及其他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虽然它在某些领域很受欢迎，但是允许其

扩张将是非常危险且具有破坏性的。

听众：我对叙利亚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态度感到好奇。我想知道是正面报道更多还是负面报道更多？叙利亚媒体是如何报道“一带一路”倡议的呢？

赫尔：如前所述，我们的政府和人民对“一带一路”都非常热情，我们参加了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也正在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交申请，只是这一申请被部分属于该银行创始成员国的西方国家拒绝了。但我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公众态度和官方态度都非常积极，没有任何消极看法。我认为，叙利亚和中国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之下的合作，与叙利亚未来的政治、经济稳定息息相关。许多行业可以成为重点合作领域，特别是基础设施、服装或其他类型的劳动密集型而非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因此，铁路基础设施、能源运输和可再生能源的基础设施是我们的核心关切。我们希望将合作扩展到更先进的高科技及其他领域中，但基本上基础设施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主要的合作领域。

王锁劳：在战争发生前，以及在伊斯兰国占领与伊拉克接壤的叙利亚东部油田之前，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就在那儿经营。不幸的是，现在这些油田都在美国或库尔德军队的控制之下。那么，中国的石油工人还可以重返叙利亚吗？

赫尔：战前中国只有在这个领域的投资，因此这是中国在叙利亚唯一的外商直接投资。我们可以发展该领域，但这确实非常困难，因为基础设施及石油管线都遭到了破坏，重建难、耗时久。因此，我们关注可再生能源，因为不同于

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获得收益的传统能源或其他能源，我们可以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行业来更快地获得利润。

听众：在当前俄罗斯与叙利亚合作的背景下，有很多叙利亚年轻人去俄罗斯学习吗？

赫尔：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源远流长，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苏联解体之前就向叙利亚提供了很多奖学金。叙俄两国是政治和军事上的盟友，俄罗斯政府现在仍向叙利亚提供许多奖学金。两国之间有着强有力的文化联系，之前有许多叙利亚学生从苏联的大学毕业，现在则从俄罗斯的大学毕业，这将持续下去。我们希望这种情况也能在中叙关系中有所反映。

杨光：我是来自清华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明年有望前往叙利亚进行田野调查。我的问题是疫情对叙利亚的影响，叙利亚为可能卷土重来的病毒做了哪些准备？

凯特贝：叙利亚正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防止新冠病毒的传播需要较高的财政能力，但叙利亚的财力却非常有限，叙利亚政府正使用现有设备，同时采取诸如停工、停课之类的措施，努力控制其传播，目前情况还算不错。

杨光：前往大马士革周边的农村地区及其他地方是否安全？

凯特贝：在北部不是那么安全，其他地区都非常安全。我们过着正常的生活。

赫尔：除西北和东北的某些地区——伊德勒布，哈萨卡和达拉索尔不安全外，其他所有城市都非常安全。欢迎您访问叙利亚，我们很乐意为您提供帮助。

王锁劳：叙利亚现在有外国学生吗？叙利亚是否仍对外国学生开放？

凯特贝：在战争中暂停的项目现在仍没有启动，因为其他人从媒体上看到叙利亚仍然不安全，他们对此感到担忧，但实际上这不是事实。

王锁劳副教授在沙龙总结时表示，在叙利亚改善其经济形势的努力中，如果能够继续保持政治稳定，对中国企业家和其他在叙利亚投资的国家都是好消息。他祝愿叙利亚能够享有内部政治安全、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他还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再次邀请两位嘉宾参加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学术活动。

“新芽沙龙”第 27 期

从校园到田野：国别研究的案例分析和学术规划

2020 年 12 月 10 日

区域与国别研究是一个跨学科领域，它的研究对象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地理、文化、经济、政治、社会、民俗、组织、制度、宗教、族群以及其它种种现象。人类社会的各种问题、人类活动的行为方式、人的思想和智识、人的生产和生活，都属于它的观察范围。为了更好地获得在地知识、深入了解当地情况，以及帮助研究者形成更为成熟与准确的研究视角与观点，区域与国别研究要求研究者能够深入所在地做田野调查。

为了进一步帮助区域与国别相关专业方向的同学们做好从校园学习到田野调查的身份角色转换，帮助同学们做好田野的行前、过程中和返回后的准备，拓展同学们的学科视野，解答同学们在区域与国别方向研究过程中的疑惑，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邀请到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段九州助理研究员介绍从校园到田野的国别研究的案例分析和学术规划，并就相关问题与同学们进行探讨。本期沙龙由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王锁劳副教授主持。

国别研究田野调查的准备、过程和收尾

段九州研究员从自己博士阶段的学习和田野经历开始，讲述了田野调查各个阶段的重点与难点。田野调查的行前阶段有三个主要的准备方面，一是语言预备；二是确定研究计

划；三是如何更简便地进入田野对象国。田野调查的实施阶段也分三个部分，一是做好心理准备，尽快适应当地生活；二是广泛交游，建立关系网络；三是开展访谈、收集资料等。田野调查的收尾阶段则主要涉及资料整理、文献反思与维护当地关系。

田野调查准备阶段：

一、语言的学习和掌握是区域国别研究者的必经之路。在全球化的今天，必备的语言素养是英语，世界范围内英语的广泛使用，使研究者可以把英语当作田野调查的敲门砖。更为重要的是，掌握当地语言是区域国别研究最基本的要求。在学有余力的基础上可以学习各国、各地方言。以阿拉伯语为例，阿拉伯各国都有自己的方言，比如有埃及方言、叙利亚沙姆方言等。此外，研究者还可充分利用肢体语言进行沟通。

二、出行前需确定研究计划并评估其可行性，而确定研究计划的过程则需要分清多个层次。需要事先具有大量的文献积累，在不触及国内与对象国敏感性问题的前提下，大量阅读文献，寻找自身研究方向与突破口。主动与导师沟通，对选题方向与目标进行调整，同时也要考虑到经费的问题，提高田野可行性。选题过程中还应保留替补选题和替补研究对象国，尽量确定两到三个题目，以及若干替补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这样当意外情况出现时，才能有备无患，减少时间成本。最后一步是在导师的帮助下确定研究选题与规划。

选题的意义亦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段九州认为，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有两个重要目的：一是取经。通过研究其他国家，学习对方的长处，汲取对方的经验，为我国发展提供思

路。二是打交道。了解对象国当地的知识，更好地与对方打交道。选题中往往容易忽略的问题是自身的研究选题对对象国和当地的意义，一些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对当地人来说却不尽然。譬如抱着猎奇的心态去研究印尼的族群，可能对印尼人的意义不大。当地的印尼人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更在乎如何提高自身生活水平，而非族群归属、族群认同等问题。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后再进行田野调查可以节省时间，大概率能够避免在当地低效率地寻找研究课题的麻烦。

三、准入机制，即如何更好、更省力地进入目的国。应对的方法有很多，比较省时省力的方式是通过身边老师穿针引线，联系到目的地国高校老师，让对方帮忙联系对象国当地的资源。外语专业出身的同学可能会结识来自对象国的母语者，可以利用当地人的资源进行联系。不过，弊端是可能会被分配到当地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系或者是中国研究中心，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关系就不深了。与之相类似的，联系当地做亚洲研究或中国研究的研究人员也是进入当地的一个方法。这些研究人员会对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感兴趣。效率较低的方法是海投申请，时间成本可能会较高，有可能很长时间都收不到任何回复。

田野调查实施阶段：

到达目的国后需要做好“断舍离”，在调整好自身心态的同时，尽快适应当地生活。很多田野对象国的学术环境一般，如果长期脱离密集专业的学术界，自身的学术能力和论文写作能力可能会受影响。可以通过树立良好的心态，和国内的导师、同学保持联系等方式尽可能地找回学术状态。安排好

当地生活后，应尽快回到文本和研究当中。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生活环境可能不如中国优越，一些国家甚至被战乱和疾病所困扰，而研究者自身也告别了国内熟悉的环境和亲朋好友，甚至面临数年不能回国的情况，这就需要研究人员提前做好思想准备。调整好心态后，区域国别研究人员也要尽快适应新环境。另外，无论当地医疗状况如何，都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行程中应做好应对准备。适应新环境、融入当地社会的一个简单方法就是融入当地的华人圈，通过华人圈辐射到当地其他社交圈，进而更好地和当地人打成一片。

广泛地交游，建立当地人脉，进入当地的本土圈也是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方面。首先需要处理好与外方导师的关系。外方导师一般是邀请研究人员前来当地的邀请人和担保人，其角色就像国内的导师，是要对学生负责的。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与外方导师的关系，会直接影响到对方高校对研究人员的评价。非目的国的外国人与当地人间也存在隔阂，外国人圈子不失为比较好的资源。自身所处研究机构的同事，以及在当地的学术交流活动中结识的学术界人士都可以为区域国别研究者带来学术上的收获以及人脉上的积累。研究人员还需要经常与当地的中国使馆保持联系，做好报备工作，以防不时之需；接待国内的学者访问团对建立国内研究人脉、树立个人区域国别研究声望的作用也不可小觑。

收集材料方面，区域国别研究人员可以通过访谈的形式，面向多个主体展开调研，譬如学者、记者、政府、案例人物和相关作者等。访谈时应注意访谈题目与访谈对象的敏感性，避免卷入当地政治风波。文本资料方面，大部分国家都有自

己的数据库、图书馆和报刊杂志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库建设可能稍差一些，但图书馆和报刊一般都有，也可以注意收集此方面的材料。

田野过程中的采风纪实和观察生活也比较重要。研究人员进入当地时，可能会发现当地独特的标志，这非常值得拍下来。以埃及为例，由于受政治、经济混乱的影响，埃及人有非常强烈的支持国货、支持本土产业发展的需求，相伴而来的是抵制外国货的呼吁。因此，埃及的超市里时常可以看到阿拉伯语书写的“支持埃及货”的标识，这些标志性的符号都可以作为采风记录下来。

田野调查的收尾阶段：

主要涉及对收集到的相关资料与数据的整理，包括资料整合、资料电子化和数据的备份（以防电脑或数据文稿的丢失）。整理资料时还应注意反思文献。研究人员在当地时，视角会融入当地，研究人员自身的观点也容易本土化，很难思考当地的情况到底如何。回国后更应以“他者”的眼光重审文献、反思文献，考察资料与当地的对应度，加深自己对课题的理解。研究人员还可以根据田野调查积累的经验，寻找新的灵感，策划未来选题。

维护与当地的关系，与当地导师、友人保持学术上、生活上的紧密联系，能够为日后研究者再次返回田野提供基础。研究人员在田野阶段可能只是了解了当地的大致情况，难以发觉课题研究可能缺乏的材料，再次返回田野的目的是为了有针对性地补足材料，丰富论文写作论证。

区域国别方法：以埃及为例

在这一部分，段九州研究员以埃及的研究实例讲解了国别研究、田野调查、文献整理与论文写作之间的关系。首先，文献阅读与积累是区域国别调查与研究的前提。如果不回顾前人研究的积累就直接进行田野调查，这和记者采风几无二致。作为一个学者，必须要有前期的文献积累和自己提出的假设，这样才能更高效地搜集资料、做实证分析。

田野调查的成果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收获常识。在国内期间通过阅读文献和新闻等方式，研究人员对目的国已经有了一定的认知。通过亲身前往目的国体验等方式，研究人员验证了已知的假设，使自己的认知更加严谨了。第二种是更新常识。对于目的国的某个认知可能存在认知偏差，认知偏差在程度上也是不同的，比如这个理论可能对了 60%，那个事实描述可能对了 80%。通过田野调查，验证认知上正确的部分，补足缺失的、错误的部分，这就是修正假设。第三种是反驳常识。区域国别研究人员进入田野调查阶段后发现原有的假设、认知是错误的，需要推翻前人的研究重新作出假设、评估和知识补充。此时提出的新的假设和问题便需要扎实的田野调查资料作为基础，这对于研究人员的发展也是较好的一次机遇。

以埃及为例，受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影响，“一·二五”革命推翻了执政 30 年之久的穆巴拉克政权。穆巴拉克下台以来，埃及陷入了更大的混乱，军方和穆斯林兄弟会之间展开权力斗争，直到 2014 前军方领导人塞西当选总统，才开始逐步恢复平稳。但埃及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仍有着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整合力，使埃及不至于分崩离析。段九州研

究员介绍的两个典型的案例分别是与少数民族冲突相关的埃及科普特问题以及埃及的军政关系。

科普特族群冲突的案例回应了田野调查结果的第二个类型：更新常识。国内的文献对科普特问题的阐述在正误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差，同时也有细致和粗略的区别：国内的研究相对粗略，需要进入田野后的调研与观察来获得更加细致的认知。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是埃及国内最大的少数民族。以往的文献认为埃及的族群冲突主要集中在科普特人和穆斯林之间，且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埃及社会和政府对于科普特人存在普遍的歧视和打压。冲突的主要原因则是宗教分歧以及基督教（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间的文明冲突。然而，在埃及的田野经历和数据搜集证实了一部分上述观点，也补充了以往认知的不足。关于两族群间的冲突和针对科普特人的歧视的说法是正确的：在穆斯林群体过斋月的时候，非穆斯林的科普特人则要加班；在军警系统或者政府录取考核的时候，存在针对科普特人的歧视现象，科普特人的录取比例更低，但并不是完全不录取科普特人。

另一些观点则不一定准确，比如两族群间冲突的主要原因并不一定是文明冲突。在所谓的宗教与“文明”身份之上，双方还有一个更高的身份认同，即对埃及文明的认同。这就引申出族群冲突根源何在的问题，两族群间具体的冲突可能更多是街头琐事，或者是地方治理和民间习俗的问题，同时冲突的爆发也存在制度性的根源，第一个是建筑修建程序的模糊性，第二个则是埃及个人身份法管辖权的碎片化。

关于埃及教堂修建程序的模糊性所带来的制度性问题，

段九州研究员通过利用当地关于族群冲突新闻的数据库，整理出了 1997 年到 2008 年 10 年间关于两族群冲突的新闻报道。在 256 起科普特人和穆斯林间的冲突当中，大部分都是和修建教堂有关。通过回溯政府文件、相关法案等文献，发现教堂相关冲突的根源可能是埃及颁布的教堂修建相关法令。法令对清真寺的修建规模进行了标准化的界定，全都有具体的数据和具体的要求，相反却模糊处理了基督教堂的相关标准，使得基督教堂的修建标准缺乏具体法律依据。很多基督教堂的修建需要依靠科普特人的私人关系获得特批，一旦特批之后，穆斯林群体可能会认为基督教堂的修建缺乏法律依据或使用了一些不合规的手段，由此建立起来的教堂就容易引起穆斯林社区的反感。这是结构性的矛盾，根植于埃及的制度之中。

关于埃及个人身份法的相关问题。埃及保有了奥斯曼遗留的针对非穆斯林的宗教自治制度（米利特制度），允许基督徒遵从自己的宗教信仰以及相关习俗和律法，即使在纳赛尔建立共和国后也没有突破这一制度。科普特正教的一项法律是不允许自由离婚，但有一些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想要通过改变宗教信仰的方法离婚，跨教婚姻、宗教变更等敏感的问题就可能引起族群间的冲突。比如 2004 年的康斯坦丁事件，一位科普特神父的妻子为了离婚而离家出逃并改信了伊斯兰教，这引发了两个族群间的冲突。类似的还有 2011 年开罗发生的族群冲突事件，也是因为有传闻说一个科普特的女子改信了伊斯兰教而引发的。

埃及军政关系的案例探讨的是埃及军队在国家体制中扮

演着何种角色。很多西方的文献认为，2011 年革命的爆发是因为总统和埃及的政治体制，他们还认为埃及军队是埃及政治制度的建立者和维护者，埃及总统一般由军人出身的人当选，所以军队一直是总统的坚定的拥护者。但是段九州研究员在埃及进行采访和社会观察后给出了其他解释。首先埃及的政治体制会引发社会不满，但这更多是以西方人的外部视角观察得来的。微观上看，2011 年的革命还需要聚焦在穆巴拉克的个人行为上，很多民众的不满是和警察暴力以及穆巴拉克意欲让其二儿子继位总统有关。警察暴力执法的问题经过网络传播发酵后引发群众不满，而警察又和军队存在种种关联：父子相传的政权更迭形式在现代埃及是不被认可的，因为总统的产生应和军队密切相关，建立王朝式的统治是不被允许的。

从 2011 年民众抗议事件引出来一个问题，埃及的军队在国家体制中扮演着何种角色？针对这个问题的案例收集与研究方法比较复杂，有文献收集、现象观察、采访等形式。从历史案例出发，军队和总统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如文献所说，军队是一直支持总统的。埃及共和国历史上出现过四次较大的社会危机，分别发生在 1977 年、1986 年、2011 年和 2013 年。其中在 1977 年和 1986 年的两次危机中，军队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了总统；而在 2011 年和 2013 年的危机中，军队则在不同程度上反对了总统。上述证据打破了文献的原有认知：军队并不总是总统的坚定拥护者。

此外，警察暴力执法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军队和国内安全部门间的张力有关。从纳赛尔时期开始，埃及就出现

了以警治军的传统。埃及总统为了限制军队的权力，着手建设国内的安全部门、情报部门和警察部门。另外，随着对外战争需求的减少，埃及国家安全威胁的转移，国家对军队的需求下降，警察力量呈上升趋势。以警治军的传统愈发强大，以致在穆巴拉克后期，警察系统成为穆巴拉克管理国家的重要工具，内政部俨然成为埃及的“国中国”，警察暴力的出现与这些现象是密切相关的。

第三是军队和大商人集团间的关系。军队在埃及国家结构中也扮演着从事技术生产的角色。从纳赛尔时期开始，军队培养了大量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这些技术人员大多在工厂、国家部门从事生产建设，因而军队也是国家的生产力量。自从与美国关系和好，埃及进行了私有化改革，国内出现了与国外资本息息相关的大商业集团（类似于商业中介），后来又演变成国际资本的实业型商人集团，尤以穆巴拉克二儿子为代表。此后，这些商人集团进入了国家管理的核心层，开始冲击埃及国内的国有资本和一些生产型的力量，由此商人集团当时和军队也产生了权力上的冲突。冲突既包括生产型的冲突，亦有权力的冲突。因为军队作为埃及政治制度的创始人，是政治制度的核心，也是生产者。

上述案例展示的就是反驳常识的成果，田野调查结果与之前的文献积累是完全相反的。埃及的建国之基是军队，但是到穆巴拉克末期，军队已经被边缘化了。首先反映在资本边缘化。资本有实力型的国内资本，如穆巴拉克儿子的商业集团，以及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的资本；其次军队作为国家体制创建人，却被警察边缘化了。上述两个边缘化导致了埃

及的政治体制难以为继，无法回应普通民众对国家发展、生活品质提升的追求，因而爆发了 2011 年的民众抗议事件。

区域国别的研究视角

区域国别研究存在着多种视角，其中一个可能的视角是国家-社会关系，这可能比较符合现在观察发展中国家的阶段。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因为国家的视角长期被忽略了。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强调了国家建构统治管理秩序的能力，他把美国和苏联同时列为优秀和强大的国家，看重的是国家治理能力而非意识形态差距。这与 80 年代后尤其是苏联解体后的西方叙事存在着较大差别，这一时期的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民主化改造、去国家化、私有化是全世界发展的主流，而对于国家能力的考量则大大减少了。

米格代尔的《强社会弱国家》则就如何进行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经典的案例，其中把埃及界定为介于弱国家和强国家之间，把以色列定为强国家，塞内加尔则是弱国家。纳赛尔曾经尝试在埃及开展土地革命，进而改造社会，但最终失败了，所以埃及属于可弱可强的国家。“阿拉伯之春”造成了诸多中东国家的政权更迭，社会持续动荡，这些国家都面临着需要重新建构国家能力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国家自主性问题，以及加强国家独立决策的能力和尽量少受商人集团或跨国公司资本侵蚀的能力。这些都是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可以探讨的问题。

以埃及为例，埃及的国家建设与发展过程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类似，先后经历了 20 世纪中期通过革命实现民族国家独立建构的过程，两极格局瓦解后因西方的强势而被跨国资

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要求改革的过程，在美国单一超强出现以及新自主市场化改革后，埃及的国家能力和国家自主性下降。而中国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保持了国家自主性，同时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不断加强。以中国为榜样，埃及等国开始反思如何重新建立国家能力。

段九州认为，在研究当今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时，重新提出国家-社会关系、国家能力和国家自主性等概念和视角是有必要性和必然性的。可以涉及的研究子视角也有很多，譬如政教关系、政商关系、军政关系和央地关系。多元化研究视角也是为了让学术研究更好地与“一带一路”倡议对接。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政局不稳的问题，如果仅仅与当地政府往来，政府更迭所带来的风险会相当大。如何深入当地社会，如何保护自身的利益，如何与当地的商人集团与家族进行商业往来等问题，都需要相关当地国家-社会关系和政商关系的研究成果来解答。对目的国整体的国家-社会关系和政商关系的研究，也符合“一带一路”倡议更加深入地“走出去”的现实性。

问答环节中有同学提问，如何平衡理论的普世性和区域国别研究的特殊性。段九州研究员认为，区域国别研究人员既要做区域国别研究，又需要对理论的推进做出贡献。比如可以做跨区域的、跨国别的比较，泰国、秘鲁、法国这些不同区域的不同国家出现的抗议示威活动可以拿来进行比较，这样可以相对容易地得出普世性的理论，仅从单一国别出发很难得出理论，或者得出的理论会十分单薄。区域国别研究不仅可以对理论做出贡献，还可以回应一些经典论断、话题，

比如上面提到的国家能力建构、国家-社会关系等，这些已经出现了几十年的经典话题可能并不能适应现今世界的发展。即便米格达尔在他的书中提到了埃及，但现在的埃及和成书时的埃及是不一样的，因此区域国别研究者可以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的最新观察成果去补充经典论断，回应经典理论。沙龙的最后，段九州研究员还鼓励各位同学深入了解自身研究国别的在地知识，夯实学科背景，从现实问题出发进行理论溯源，保持初心和本位，在立足于事实的基础上开拓区域国别研究的新领域。